

陈雪竹

著

明清

北音介音研究



明清

北音介音研究

陈雪竹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北音介音研究/陈雪竹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5004-9210-8

I. ①明… II. ①陈… III. ①汉语—语音—研究—
明清时代 IV. ①H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2809 号

责任编辑 王 茵

责任校对 王有学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8.75 插 页 2

字 数 210 千字

定 价 2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到目前为止，对于近代汉语语音的研究已经为时不短了，但是对于介音的研究则比较冷清。我揣度其中的原因，首先是元代以来北方话就形成了“四呼”的格局，至今未变，介音格局之内的变化不关乎韵部分合，所以人们把它看轻了。再有就是一个学术领域的研究会经历逐渐展开的过程，即由粗到精、由大到小、由简到繁、由主体框架到内部细节的过程，所以声母、韵部、声调首先被重视，作为韵母内部构成成分的介音则没有在早期引起足够的关注。其实从元代以后北方话的介音有不少变化，地区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别，非常值得关注。雪竹同志这本著作的出版，将改变以往近代北音研究中介音部分被冷落的状况，使音系各部分的研究趋向平衡。据我所知，本书是全面系统地研究数百年间北音文献中的介音问题的首部专著（其实以往这方面的论文也很少），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填补空缺、加强薄弱环节，也有助于近代音的总体研究。

语音史的最终研究目标是搞清楚实际语音的演变情形，依据的是传世文献和现代方言，文献的作用更为重要，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近代汉语”阶段的音韵文献材料中所记载的介音纷歧错杂，造成这种状况的成因也是复杂的。除了各个次方言的分歧之外，韵书、等韵图的分类各有不同原则。有的以现实语言为根

据，有的以书面上的古音为根据，后者就不能反映真实的语言现象。还有不少的是兼容时音与古音，尤需仔细对待。像本书中讲到的《元韵谱》在时音的框架内借用四呼区分古音、《四音定切》在古音的框架内以“平、峭”辨别时音，都让真实的四呼变得若隐若现。一部书的音系分类方式，还往往受制于作者的主观因素，包括审音观念、审音水平、编纂目的等。审音观念影响到音系分类的，如赵绍箕的《拙庵韵悟》为精组字和照组字的开口呼单独设立名目，独立于四呼之外，而多数人则归开口呼。编纂目标影响到音系分类的，如乔中和的《元韵谱》，既从《易》理出发理解并阐释语音，又有兼顾古音的意图，四呼分配很多是背离时音的。此外，正如本书第三章所列出的，还有其他一些特别的编纂体制也干扰着时音的辨别。面对这样一些由复杂的原因构成的音系，准确地分析它们的性质，辨别真正的时音，委实不容易。本书作者以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的功夫，经过细密梳理，把各种分类方式的成因一一厘清，基础工作是十分扎实的。

对象的复杂性注定了研究工作的繁重性，也在研究方法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研究者需要在对研究对象的各个方面有透彻的认识理解的基础上，找到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本书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有多方面的发明创新。比如唇音字洪音的开合归属是个困扰人的问题，本书中的方法是考察一书中反切上字的运用规则，如果非？韵母唇音字使用的反切上字与？独立作韵母的唇音字所使用的反切上字一致，这部分字就是合口呼，反之则为开口呼。近代北音著作中的普遍的反切规则是运用这一方法的前提，自从明代等韵学家改良反切以后，新作的反切一般要让反切上字和被切字有相同的介音，所以这一方法的运用有其充分的客观基础和现实可靠性。当然还要针对具体情况作细密的分析，本书关于《交泰韵》的研究就是有说服力的例证。

“北音”包含了官话方言区各个次方言的语音。一地之音的演变过程就一定有复杂的复杂性，不同次方言之间更有程度上的差异，同一种演变现象在不同的次方言里会不同步，甚或有不同方向的演变。从本书中我们得知，明清时代北音中虽然四呼的格局稳定不变，但是在声母与介音的组合关系上，历时变化和共时差异还是不小的。最显著的演变是唇音字洪音的合口变开口、照系字的细音转变到洪音以及果摄字的开口转合口、见组精组字的合口三四等从撮口变合口等。本书重点研究了这几个问题，分析了它们的时间、地域差异，也分析了文献音系中很浓厚的因袭守旧色彩。通过本书我们对明清时期官话方言的介音演变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也对音韵学文献的音系构成的多样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本书是雪竹同志勤奋严谨和守正创新精神的结晶，是一部有分量的著作。作为师长一代，在嘉许之外，自然也期待她以一如既往的笃实与锐气，在治学的道路上塌实迈进，更有作为。因此我写下这篇短短的“读后感”缀作序言。

耿振生

2010年10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 研究对象.....	(1)
(一) 北音.....	(1)
(二) 介音.....	(2)
二 研究现状.....	(4)
三 本书研究的目标及意义	(13)
四 研究材料	(14)
(一) 研究材料的范围	(14)
(二) 研究材料的分类	(15)
(三) 研究材料的性质	(16)
五 研究方法和途径	(20)
第二章 明清等韵学介音理论	(23)
一 明清等韵学家对“等”的认识	(23)
(一) 探究“等”的中古意义	(24)
(二) 变四个等为两个等	(29)
(三) “呼”取代“等”	(31)
二 明清等韵学家对介音的认识	(33)
(一) 对介音的描写	(33)

2 / 明清北音介音研究

(二)对介音与声、韵关系的认识	(35)
(三)对介音重要性的认识	(40)
第三章 明清北音书面介音系统的几种情况	(45)
一 介音系统体现在反切上字中	(45)
(一)《交泰韵》中唇音及知系字的介音情况	(46)
(二)《李氏音鉴》中唇音及知系字的介音情况	(52)
二 书面介音系统标注不完整	(60)
三 韵图间的传承关系影响到书面介音系统	(68)
四 借介音的框架体现古韵类、声类的区别	(76)
五 舒入相配关系影响到书面音系中入声字的介音	(80)
六 守旧的书面介音系统中包含时音	(87)
(一)《音韵阐微》	(88)
(二)《四音定切》	(91)
七 书面介音系统兼容南北音	(96)
八 韵图中的特殊呼法	(99)
第四章 唇音字的介音	(112)
一 唇音字介音的情况	(113)
(一)轻唇音	(115)
(二)重唇音	(120)
(三)特殊情况	(124)
二 唇音字介音的分析	(125)
(一)轻唇音字介音问题	(125)
(二)重唇音字介音问题	(138)
(三)呼法不同的重出字的性质	(144)
三 唇音字介音的地区差异及演变	(149)

目 录 / 3

(一) 轻唇音字介音的地区差异及演变	(149)
(二) 重唇音字介音的地区差异及演变	(153)
(三) 小结	(158)
第五章 知系字介音	(159)
一 知系三等字的介音	(161)
(一) 韵图中知系三等字介音的情况	(161)
(二) 知系字三等字介音的地区差异	(162)
(三) 容摄知系三等字的介音	(169)
二 知系开口二等字的介音	(171)
(一) 江淮地区	(172)
(二) 四川地区	(178)
(三) 华北地区	(179)
三 影响韵图上知系字介音地位的主观因素	(182)
(一) 音系中兼顾古音影响韵图中知系字介音的地位	(182)
(二) 对止蟹摄知系字介音认识不同造成韵图中知系字介音地位不一致	(187)
(三) 知系字归呼标准不同造成韵图中知系字介音地位不一致	(189)
(四) 韵图结构约束韵图中知系字的地位	(190)
第六章 其他问题	(195)
一 果摄字介音	(195)
二 见、精组合口三等字介音	(202)
三 开口二等喉牙音的介音	(206)

第七章 结论	(209)
附录 研究材料简介 (215)	
一 北京	(215)
二 河北及天津	(219)
三 东北	(222)
四 山东	(223)
五 山西	(226)
六 中原	(227)
七 江淮	(229)
八 云南	(237)
九 四川	(239)
十 普通音类	(240)
十一 混合类	(243)
参考文献 (255)	
(一) 文献材料	(255)
(二) 参考著作	(259)
(三) 参考论文	(261)
后记	(268)

第一章

绪 论

一 研究对象

(一) 北音

古代学者很早就认识到南北音的不同，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就说到：“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沉浊。”^① 自宋以来，“南音”、“北音”并举在文献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近代。这些文献中的“南音”泛指各南方方言，有时特指吴语之音或江淮方音；“北音”则指黄河一带的语音，有时也特指北京音。例如清代莎彝尊在《正音咀华·十问》中说：“何为南音？答曰：古在江南建都，即以江南省话为南音。何为北音？答曰：今在北燕建都，即以北京城话为北音。”^② 虽然各家对“南音”、“北音”的具体所指不尽相同，但都是从地域的南北来区分它们。

①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条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

② 莎彝尊：《正音咀华》，清咸丰三年尘谈轩刻本。

20世纪以来，“北音”一词有特指汉语共同语语音的趋向。钱玄同先生认为“北音”即指以《中原音韵》为代表的一系韵书所表现出来的语音，虽然“《中原音韵》一系之韵书皆根据当时北方话语言之音而作”，^①但是“大家讲话之声音于不知不觉之间，早已同化于北音，早已默认北音为标准语音”。^②这样，“北音”就是指南北各地都通用的共同语语音。

本书研究的“北音”包含钱先生所说的“北音”，同时也包含更广义的“北方方言区”^③的语音。现代汉语的“北方方言区”包括长江以北地区以及长江南岸四川、云南、贵州和湖北、广西、湖南的部分地区。“北方方言区”的这个格局在明清时期已经基本形成，“北方方言区”内部各地的语音在明清时期已经具有较大的一致性，比如声母系统中都没有了全浊声母，韵母系统中都没有了收 [-m] 韵尾的闭口韵，介音系统都是开合齐撮四呼的格局。同时，不同地区的音系也体现出各自的特点，比如中原地区的音系中保留微母 [v]，江淮地区的音系中泥母 [n]、来母 [l] 不分等。研究这些音系，对于了解汉语语音的发展情况有重要的作用。我们所说的“北音”就包括这些地区的音系。

（二）介音

介音在语音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明清时期介音也发生不少变化，这两点决定了明清语音中介音系统的研究是近代汉语语音

① 钱玄同：《评赵荫棠的〈中原音韵研究〉》，载《钱玄同文集》（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3 页。

② 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6—77 页。

③ 北方方言区也作官话区。

研究中重要的部分。

介音是汉语音节结构中介于开首辅音与主要元音之间的语音成分。作为音节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声母、主要元音、韵尾有密切的关系，其他诸要素的发展往往与介音相关联，比如中古精、见组声母的腭化，中古知章庄组声母翘舌化，中古“皆佳陌麦”诸二等韵中“皆解戒鞋”等字 [-i] 韵尾的脱落都是以介音为条件的。因此，对介音系统的研究是语音系统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部分。

明清时期，介音的发展是语音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声母、主要元音、韵尾以及声调来说，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基本格局在元代已经形成，自元以后，这些语音要素的发展变化都比较小。介音的情况不同，在明清时期介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只有 [-i]，[-u] 和一个复合介音 [-iu]，发展为 [-i]、[-u]、[-y] 三种介音，加上不带介音的一类，形成现代汉语的四呼系统，完全改变了中古时期两呼四等的局面。李新魁先生曾说：“就近代整个汉语共同语的语音发展过程来看，介音的发展演变算得上是一个最主要的内容。”^① “现代汉语与元代汉语的不同，主要就是表现在介音上的差异以及由介音的差异所造成的音节结构与韵母系统的区别了。”^②

介音在明清时期发生的变化不仅仅是剧烈的，而且表现出不平衡的状态，不同地区介音发展的过程及速度存在着差异，全面了解明清时期介音在不同次方言中的发展史，对于认识汉语各方言在语音上的分歧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① 李新魁：《近代汉语介音的发展》，载《李新魁语言学论集》；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177 页。

^② 同上书，第 199 页。

二 研究现状

一直以来对明清时期语音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对这个时期韵书、韵图研究的基础之上。前人对明清时期介音的研究大多是包含在对整个音系的研究中，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对单个音系中介音的研究

上个世纪 30 年代以来，赵荫棠、陆志韦、王力等先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韵略易通》、《等韵图经》、《西儒耳目资》、《类音》音系的文章，到了 80 年代更是出现了大量研究明清时期某一种或某一类韵图的文章，这类研究基本涉及了目前所能看到的明清时期的各个韵图。这些研究中描写了单个韵书或韵图中的语音系统，也包括了介音系统，大部分文章把介音放在韵母系统中描写，只有少数把介音作为独立的系统描写。由于明清韵学著作中只能体现出介音的类别，不能看出介音的音值，因此现代学者在对一些音系中介音音值的认识存在分歧，主要集中在对唇音字以及知系字介音的认识上。比如《李氏音鉴》中重唇音洪音字李新魁先生认为读为合口呼：“明纽字（[m] 声母字）中的 [u] 音尚存在，不变为 [ə]，如门字（麻魂切）仍念 [mun]，不像后代念 [mən]，蒙，（麻红切）仍念 [mun]，不读为 [mən]”^①而杨亦鸣先生认为是开口呼：“我们的看法截然不同，首先，‘门’‘蒙’都属于满母，满母内的字‘音皆一律，粗细不分’均

^① 李新魁：《谈几种兼表南北方音的等韵图》，载《李新魁音韵学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31 页。

为开口呼（除第四韵的 [u] 韵母‘模’字外），从《音鉴》的反切特点看，上字决定介音，‘麻’字既为开口呼，故‘门’字仍念为 [mən] 而不念 [mun]，‘蒙’字仍念为 [məŋ]，而不念为 [muŋ]。”^①《李氏音鉴》中的中古知章组三等字，李新魁先生认为，“[tʂ] 组声母字（原知三、照三组字）的反切下字绝大多数仍用带 [i-] 介音的字，……说明此时的 [tʂ] 组声母仍与 [i-] 介音相拼，读为 [tʂiaŋ] [tʂin] [tʂiou] 等”。^②杨亦鸣先生认为“都读为开口呼”。^③

在这些研究单个音系的文章中，有些对介音系统中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比如王力先生的《〈类音〉研究》细致地分析了《类音》中的四呼系统，认为它呈现出一种紊乱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因为潘氏“斟酌古今”以及断定一音必有四呼的思想造成的，因此这个介音系统不是实际语音的体现。^④邵荣芬先生的《〈韵法横图〉与明末南京方音》^⑤和《释〈韵法直图〉》^⑥分别总结了《韵法横图》、《韵法直图》的介音系统，认为《韵法直图》在呼法上盲目抄袭了《韵法横图》，两图的介音系统中都有明显存古的因素。李新魁先生在《汉语等韵学》中对《元韵谱》中介音系统与时音不符的情况解释说：“由于每一个声母都要配成四呼，在某些韵类中就难免出现牵强附会的毛病。例如对读为

① 杨亦鸣：《〈李氏音鉴〉音系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

② 李新魁：《谈几种兼表南北方音的等韵图》，载《李新魁音韵学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1页。

③ 杨亦鸣：《〈李氏音鉴〉音系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

④ 王力：《〈类音〉研究》，载《王力文集》（第十八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⑤ 邵荣芬：《〈韵法横图〉与明末南京方音》，《汉字文化》1998年第3期。

⑥ 邵荣芬：《释〈韵法直图〉》，载《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ou] 的撮合和读为 [au] 的褒括，它们本没有合口和撮口的字，但为了凑足四类，结果就把某些字列于合、撮两呼，这就不符合实际语音。”^① 耿振生先生的《〈青郊杂著〉音系简析》中认为音系中的 uou 和 uau 两个韵母不存在，因为在尤部和萧部的合口呼中只有唇音字，《青郊杂著》中所有洪音唇音字都归重科（合口呼）而不归轻科（开口呼），“这种对唇音字的处理方式在古代音韵学中较为普遍，不一定意味着当时读法跟现代不同”。^② 杨亦鸣先生的《〈李氏音鉴〉的粗细理论及反切特点》分析了《李氏音鉴》中反切的特点，指出：李汝珍的“粗细”和通常所说的洪细有所不同，兼指声韵，都与介音有关，进一步由此得出从李氏反切中确定介音系统的方法。郭力先生的《〈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研究》从整个音系的情况推测出唇音字的开合，认为“从《图经》音系声、韵、调各方面情况看，都已经很接近今北京音，唇音字的开合情况也应与整个音系一致，不应与今音有太大区别。因此陆志韦先生推测《图经》唇音字大部分已和今音一样读为开口，我们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③

在对介音系统具体问题的研究中也存在着分歧，比如对《直图》中“混呼”的看法就有多种。赵荫棠先生对《直图》“混呼”的理解是：“单就世人所常见之韵法直图来说，江韵之记为混呼者，系开齐混，肩韵之记为混呼者，系齐撮混；冈韵之记为‘平入开口呼，上去混呼’更足见该韵之平入无问题，而上去之呼法不能一致也。”^④ 麦耘先生认为：“至于江、冈两韵的‘混呼’，笔者认为是表示这些韵中有两种不同的介音存在，因而是混合的

^① 李新魁：《汉语等韵学》，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91 页。

^② 耿振生：《〈青郊杂著〉音系简析》，《中国语文》1991 年第 5 期。

^③ 郭力：《古汉语研究论稿》，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3 页。

^④ 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商务印书馆 1956 年版，第 112 页。

呼法。”^① 赵、麦两位先生都是认为《直图》的“混呼”是混合了两种不同的介音，具体是哪两种呼法相混，两位先生存在分歧。赵先生认为是开口和齐齿呼相混，麦先生认为江韵中来自中古宕摄三等的字是齐齿呼，亦即介音为 [-i-]，而来自中古江摄喉牙音的字则另有一个介音，最有可能的便是接近于齐齿介音 [-i-] 的 [-r-]。何九盈先生认为：“庚青、江阳二部都有‘混呼’，实则庚青混呼应归撮口，江阳混呼应归齐齿。”^② 邵荣芬先生也认为《直图》中的“混呼”并非是两种呼法相混：“到了《直图》，《横图》合列的韵都已经分开，各自独立成韵，但仍然标为混呼，于是就造成了名不副实的局面。”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是因为《直图》是模仿《横图》而作，“不顾韵类划分的差异，盲目抄袭前人术语”。^③

这些对单个音系中介音的研究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明清时期介音系统的基础。

2. 对明清时期介音系统发展的研究

对明清时期介音系统发展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通论类的专著中，这类专著广泛收集、整理了明清时期的韵图，进行分析研究，并根据音系的性质加以分类。做这种通论类研究工作的主要有：赵荫棠（1957）、李新魁（1982）、何九盈（1995）、耿振生（1992）、叶宝奎（2001）等诸位先生。他们的著作中大都概述了明清时期介音的发展情况。李新魁先生在《汉语等韵学》第三章“等韵的起源和发展”中说：“宋元时代的四等两呼，在明代首先

^① 麦耘：《音韵与方言研究》，广州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5 页。

^②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26 页。

^③ 邵荣芬：《〈韵法横图〉与明末南京方言》，《汉字文化》1998 年第 3 期。